

序

杨振昆

泰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泰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西汉时期，中国的航船就到达过泰国地区。东汉至隋唐时期，泰国地区领土上曾经出现过狼牙修国、堕罗钵底国、盘盘国等国，都和中国有过交往。宋元时期，中泰两国的交往进一步发展，不但中国的商品输往泰国，而且中国的生产技术也传入泰国。明朝时期，由阿瑜陀王国统一后的泰国和中国的交往进入了最频繁的时期。在清朝的 200 多年间，中泰两国仍然保持着密切交往的关系。从民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虽然由于政治的关系和对外关系的原因，中泰两国有过一些隔膜封闭的日子，但是民间的交往都始终不断。1975 年中泰两国正式建交，使中泰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尤其是 80 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使两国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交流的时期。

时代给研究者提出了课题，对泰国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促进中泰的友好交往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关于泰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都有涉及的论著，已不鲜见。但其中专题研究中泰文化交流的专著则很少。施荣

华先生的《中泰文化交流》一书就有了它特殊的价值。全书分为历史文化交流、民族文化交流、风俗文化交流和近代文化交流四部分,为进一步研究中泰文化交流史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脉络。

关于文化,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曾下过一个很有影响的定义:“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众的特定部分所共享。”对文化的研究中,通常较多注意显型式样的研究,即对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的研究,而往往忽略对隐型文化的研究,如对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

《中泰文化交流》一书值得肯定的是,它不仅注意了显型文化的研究,概述了中泰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而且注意了隐型文化的研究,探讨了促成中泰文化特殊联系的民族文化和风俗文化的深层原因。中国和泰国虽然不直接接壤,但两国有多种跨境民族。泰国人民热衷于到中国云南西双版纳旅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族源的一种寻找,他们常会发现傣族的生活习俗甚至语言和作为泰国主体民族的泰人惊人的相似。这种民族和风俗文化的联系是国家之间历史文化交流的潜在动因。我曾三次赴泰国访问和进行学术交流。常常感到泰国的整体文化氛围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少有和西方国家交往的隔膜和陌生。这种精神文化的认同,对中泰的文化交流将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云南面临东南亚，改革开放使云南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日渐频繁。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从政府到民间多层次地开展。尤其是泰国，它的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稳定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经验值得我们思索。这种思索应该是在彼此了解的基础上的思索。施荣华先生的《中泰文化交流》为我们了解泰国，了解中泰的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提供了很好的读本。

施荣华是从事文艺学和美学研究的大学副教授，他在中泰文化交流的研究方面出了这一成果是我没有料到的。往往一些人把学术研究封闭起来，认为越是搞得玄乎其玄，越是莫测高深，似乎就越有学问。其实，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呼唤学者走出“象牙塔”，在研究基础科学的同时，也重视应用科学的研究，使知识真正服务于社会。在这方面，施荣华可以说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喜欢他写的《中泰文化交流》一书，我相信读者也会看到这本书的价值。因此，当他要我为之写序的时候，我也就慨然应允。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为中泰文化的交流，为促进云南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一些实际的工作。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诸国处于多重交汇的重要地带，是一个文化碰撞的特殊区域。古代多种民族在这里迁入迁出，东亚大陆的农耕文化与西太平洋渔猎文化在这里交汇；中国中原的儒家文化和印度次大陆的佛教文化在这里融洽扩散。这是中泰两国文化交流的大背景。

泰国原名暹罗，1939年更改国名为泰国。

泰国人曾称“暹罗”人，与我国傣族、壮族，在语言上同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族源相近，与我国古代的百越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早在两千多年前，泰族（泰国的主体民族）和傣族（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就生活在今泰国北部、东北部和云南西双版纳、德宏等广大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地区。

第一编 历史文化交流

有关泰国古代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目前主要依据中国史籍的零星记录,有关泰国地区的‘金陈’等国家是中国史书对泰国地区国家的最早记录。距今 5000 年之前,已有中国沿海地区属于百越民族的族群迁徙入中南半岛。

一、原始的稻粟文化和彩陶工艺

距今 1 万年左右,生活在泰国地区的原始祖先已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泰国西北部的仙人洞遗址就表现了那个时期的文化特征。在仙人洞遗址的上层文化层(距今 7000—8000 年地层)发现了不少植物的果实,诸如椰子、胡椒、瓜类和豆类等。有的专家甚至认为这些果实是人工栽培的。但仅就利用植物果实种类之多,也可窥视到泰国祖先农业文化意识之高。另外,在仙人洞遗址还发现了陶器碎片,及磨制的石刀、石斧等。

与泰国仙人洞遗址相对应的是中国河南仰韶遗址,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仰韶遗址发现了石斧等农具和彩陶。而在中国陕西半坡遗址还发现了一陶钵粟,

这钵粟是作为殉葬物放置在墓葬中的。当时中泰两国的祖先还不可能有什么往来和交流，但他们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都认识到种植农业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这正如华裔美国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所认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实际上属于同一文化区域。^① 张光直先生的结论也许在时间和空间上还可以放大。

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攀牙、北碧、乌龙呵叻诸府都有原始岩画发现。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呵叻高原、湄公河畔乌龙府孔敬的岩画。画面以动物、工具和人物为主，主要反映的是狩猎生活。绘画颜色几乎全着红色，黑色与黄色用得极少。这与中国云南澜沧江支流沿岸的沧源、耿马等地发现的岩画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反映了云南南部和泰国的族群可能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有联系了。

公元前 5000—6000 年，泰国已开始栽种植物，人们活动的地域已从山区转向低地，从狩猎和采集的经济阶段向农耕经济阶段过渡，进入到低地原始农业村社时期。她的重要标志就是稻米种植的出现。在泰国东北部隆努卡等遗址中，不仅发现了有居民聚落的遗迹，还发现了被称为‘茵迪卡种’的稻谷。这种稻谷直至今日泰国仍有种植。‘印度支那半岛最先种水稻，后经亚洲东南、中国，而

①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 年 1 月第 1 版，第 24 页。

传入阿拉伯。^{*①} 实际上,中国黄河流域及云南也是最早发现原生稻的地区。

考古挖掘表明,泰国大约于公元前 3500 年之前,便逐渐形成了种植水稻、驯养家畜和铜、青铜冶炼术。大约公元前 1500 年,出现了铁的冶炼。而泰国班清遗址发现的彩陶跟中国仰韶彩陶有许多类似之处。这种彩陶制作精美,纹饰丰富,主要有罐、釜、钵、大口杯等,红色表面,表里磨光,并有彩绘。这说明当时已使用陶轮制作陶器,用的是硬质陶,彩釉的材料是红赭石与其它成份合成。彩陶的纹饰繁纷,有曲线形图案、螺旋形图案、几何形图案,花形图案和兽形图案等。由于陶器文化兼有形体、线条(曲线)、图案(纹饰)和色彩。因此,它拥有更多的艺术手段,反映更为复杂的现象和观念。泰国的这种印纹陶主要来自中国南方的印纹陶。无论在彩陶的制作、造型和纹饰上,都充分说明两者的相似性和递承关系。至少在 3000 多年前,中国发达的几何印纹陶,就已经通过族群的迁移传播到了泰国,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泰国西南部北碧府的班高出土的陶器中,比较完整的有 18 件。它们器形不一,有圆底深腹的缸,高足浅口的碗,还有类似于中国鼎的三足器。多数陶器呈黑色,也有一些土红色的和灰色的,有些陶器表面还有绳纹。泰国班高文化带有中国龙山文化的因素。在班高遗址中还发

①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 年 1 月第 1 版,第 24 页。

现了陶纺轮、干栏式建筑的柱干和方角石锛，这主要是受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制陶工艺的发展，陶器的广泛制造和磨光石器的流行，表明中泰两国在远古时代的生产力发展和人们有了较为丰富的食物和多方面的生活需要。

还值得一提的是，泰国的铜鼓文化与中国的铜鼓文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本世纪 60 年代在泰国北碧府的翁巴洞发现了 5 面铜鼓。这 5 面铜鼓估计为 2000 多年前的遗物。鼓面有羽人纹晕、鸟人纹晕和船的图像，它们可能是由铜釜或陶釜演变而来。中国云南是世界铜鼓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古代，云南的铜鼓文化逐渐由云南西部向东部和东南部传播开来，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演变并产生了地区型铜鼓。铜鼓传到泰国后，很快就被泰国先民所喜爱。他们根据自己的审美文化意识，创造了富有泰国特色的铜鼓，创造了具有民族特征的铜鼓文化。

二、孟人国家(公元前 3 世纪 至公元 1238 年)

孟人是东南亚地区的古老民族之一，主要活动在泰国的中部和南部。孟人国家是泰国地区最早出现的国家，当时大约有 50 万人口。孟人建立的国家有四个 金邻、林阳、墮罗人钵底国和哈里奔猜国。

1. 金邻与林阳

公元 3 世纪前,孟人在湄南河盆地上建起了两个国家,即中国史籍所说的金邻和林阳。前者大约位于今天泰国那空帕统一带,包括北碧府南部、叻叻府和夜功府等;后者的范围大致在今天泰国的西南部。

当时中国正处于战国后期,中原地区的生产力进步,文化程度较高,习惯把中国以外的土地叫做‘四裔’或‘海外’,华族以外的民族叫做‘诸夷’。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自秦朝起,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西汉时期,汉武帝利用庄蹻对中国云南的开拓,逐步打开了与东南亚诸国文化交流的道路。三国时期,地处江南的吴国,曾在公元 245 年左右派官员朱应和康泰奉命出使访问扶南(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吴大将吕岱遣朱应、康泰出使海南。朱应、康泰所经历及传闻凡百数十国,大抵林邑、扶南等国与‘西南大海洲上’(南洋群岛)诸国是朱应、康泰所经历,大秦、天竺等国则得自传闻。”^① 这两位官员考察了东南亚回国后,朱应著《扶南异物志》、康泰著《吴时外国传》(两书唐以后亡佚),介绍海外地理知识。^②这两本书中所描写的情形,是中国古籍对泰国地区最早的记录。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 196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14 页。

现代的暹罗湾,古称金邻大湾,就是得名于古代的金邻国。《太平御览》(卷 790)金邻国条记载:“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里。地出银,人民多好猎大象,生得乘骑,死则取其牙齿。”而在另外一些中国古籍中说,在公元 3 世纪时,林阳已有“民十万余家”;“举国事佛”。金邻和林阳可能是从部落联盟发展而形成的最初国家。除此之外,在中国的古籍中还记载了当时泰国地区的其他小国,如顿逊、盘盘、箇罗(亦称哥罗富沙,在克拉地峡)、狼牙脩(又称朗迦、狼牙须、郎迦戎、棱加、凌牙斯迦、龙牙犀角、龙牙加貌,在今春蓬、克拉一带)、赤土(在今宋卡地区)。这些孟人小国约出现于公元 4—5 世纪之间,他们都是城邦国家,处于当时的主要交通要道上。

20 世纪 20 年代,曾在泰国蓬迪出土了公元 2 世纪时期的小铜佛像。这表明,当时泰国地区已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影响。而中国在魏晋时期,佛教思想逐步深入人心,有的僧徒为探求梵本,开始了西行求法活动。

公元 424—464 年间,盘盘国曾派遣使者访问我国刘宋政权。以后在公元 527 年,529 年 5 月,534 年 8 月,又三次遣使到中国梁朝,送来象牙、画塔、舍利以及沉檀等各种名贵香料作为礼物。直到唐朝贞观年间(公元 627—649 年),盘盘国的使者还来过中国。^①

公元 607 年,中国隋朝派遣常骏、王君政等人出使赤土。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派出使者访问泰国地区。这一

^① 《梁书》卷 54《盘盘传》;《新唐书》卷 222 下《盘盘国传》。

年的 10 月,隋朝的官吏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带着大批礼品出使赤土。他们‘自南海郡(广州)乘舟’出发,经越南,沿暹罗航行,顺克拉地峡东岸南下,进入了赤土国境。中国的史籍《隋书》是这样记载这次航行的:“……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迦钵跋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狮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之界。’^①常骏一行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鏤以纜骏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香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拟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时,那邪迦又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盘以籍诏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皆坐。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骏等还馆,又遣婆罗门就馆送食,以草叶为盘……后数日,请骏等入宴,仪卫导从如初见之礼,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螭蝓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坐于地席,各以金钟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②常骏一行完成出使任务回国时,又受到赤土国王的热烈欢送,“寻遣那邪迦随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

① 《隋书》卷 82《赤土传》。

② 《隋书》卷 82《赤土传》。

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令婆罗门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山而行……循海北岸,达于交趾。”^①

这是中国与古代泰国地区最早的文化交流,双方的态度是诚恳、友好和积极的,为以后更大范围的接触与交往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然,在古代,这种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不可能脱离官方色彩的,都是在当时统治者的倡导下进行和展开的。从这些中国古籍比较粗疏的描述中,也能反映出古代中泰两国人民真诚相待,友好交往的历史风貌。

2. 堕罗钵底国与哈里奔猜国

公元 6 世纪以后,扶南国开始衰落,孟人在湄南河下游建起了堕罗钵底国。这是泰国地区古代一个重要的国家。它地域广阔,经济发达。其首都可能在今佛统。本世纪所挖掘的沙占婆古城遗址,其年代为公元 600—800 年。另外,在佛统和沙占婆都发现了石佛像,这表明堕罗钵底国当时已具有了较高的文化。中国唐代玄奘和尚的《大唐西域记》卷 13 中就有关于堕罗钵底国的记载,而著名僧侣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 1 中称之为“杜和钵底国”,新旧唐书则称之为“堕和罗”或“投和”,说这个国家“无蚕桑,有稻麦麻豆,畜有白象、牛、羊、猪,俗喜楼居,谓为干栏,以白毡朝霞布为衣。”^①

^① 《新唐书》卷 222 下《河陵传》

堕罗钵底国的前身是金邻和林阳两国。它松散管理的范围相当广,北达猜纳府,南至叻武里府,西及北碧府,东到孔敬府,中心处在湄南河盆地。由于它处在交通要道上,因而商业贸易很快兴盛起来。中国的《通典》说其‘国市有六所,贸易皆用银钱’。‘民多以农商为业’。国王和贵族的宅第‘覆屋以瓦,并以阁而居,屋壁皆以彩画。’^①堕罗钵底国土地平坦肥沃,宜种稻、麦、麻、豆等植物,泰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稻谷的国家之一,稻谷业成为国家的主要产业。丰裕的稻谷生产,使人民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从事文化和宗教等活动。当地还盛产珍禽异兽,尤以“堕和罗犀”最为著名,被誉为“美犀”。此外,国内国际贸易也十分活跃。

公元 638 年和 649 年,都有堕罗钵底国的使者到中国的长安,交换两国君王的书信。使者受到朝廷的热情接待。使者带来了象牙、火珠、白鹦鹉等礼物,带回了堕罗钵底向唐朝要求的良马和铜钟。^②类似这种使者互访,在以后的中国与泰国的交往中日益频繁。

公元 7 世纪下半叶,在现今泰国北部还出现过另一孟人统治的国家:哈里奔猜国,其中心就在今日的南奔。据说这个国家的最初统治者是来自南部的孟人公主占萨末旦维。所以我国古书又称其为“女儿国”。

孟人国家是泰国领土上较早出现的国家,由于资料

① 《通典》卷 188

② 《旧唐书》卷 197《堕和罗传》

的缺乏,只能从中国的古籍中了解到一些基本情况。孟人很早就接受和信仰佛教,是泰国和缅甸传播佛教的先驱。佛教传入泰国地区大约在公元 3 世纪之前,当时吴国的康泰在《扶南土俗记》中说,林阳‘土地奉佛,有数千沙门持戒六斋日,鱼肉不得食’。那时主要奉行大乘佛教,禁食肉食。中国唐代爱州人大乘灯禅师,曾‘幼随父母汎船往社和罗钵底(即堕罗钵底)方始出家’。^①堕罗钵底的佛教艺术不仅独具一格,而且是泰国最早的佛教艺术风格,称为堕罗钵底风格。在考古发掘中找到了属于那个时期的一些佛像、浮雕和法轮等。最早传入泰国的印度式金塔就在佛统。这个佛塔高达 127 米,塔内珍藏佛骨,为世界最高佛教遗址。另外,由于孟人公主占萨末旦维从南方带来了一批佛教僧侣,从而使佛教在北部地区广为传播,公主仅在南奔就建起了 500 余座佛寺。

孟人国家由于农业的兴盛,便推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堕罗钵底国的冶金技术已非常精湛,贵族利用黄金加工成装饰品。林阳国的市集已有早晚之分,早市与晚市的商品不同:‘朝市诸杂米、甘果、石密,暮市但货香花。’^②另外,由于泰国地区南部处于当时国际交通要道上,在公元初期或更早,罗马帝国与印度到中国贸易的一条路线,就是从印度进入缅甸的阿拉干,经毛淡棉,沿著名的三塔径,直下泰国南部,横跨越南半岛东南部,转往中国。蓬迪

①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② 《太平御览》卷 787。

就是这条路线上的必经之地，从而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当时的国际贸易点。其商货主要为土特产，尤其是珍禽异兽和各种香料等。

泰国地区的这些早期国家从一开始就和中国出现了相互影响的关系，他们通过与中国的贸易等途径，不仅获得了大量先进的生产工具，促进了本国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学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等。中国南方的群众也向他们学习农业等方面的生产技术，这种相互学习的关系，在两国相同民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素可泰王国(公元 1219—1438 年)

1. 罗解

公元 10 世纪末，在泰国湄南河下游的华富里出现了一个蒙人国家，即罗解。它可能是在堕罗钵底衰落时独立出来的。当时，罗解既是邻国真腊(其地在今柬埔寨)的属国，又同中国有着频繁的贸易关系。据中国史书记载，罗解国气候和煦如春，粮食丰盈，自给有余，向邻邦出白。“地平衍，种多获，暹(素可泰)人仰给焉”。^①还说罗解人种植的浮稻，只要适时播种“苗随水以渐而长，水尺苗也尺，水暹苗熟。有播植，无耕耘，故谷丰而贱”。^②罗解人还能煮海为盐，酿秫为酒”。^③罗解盛产驰名的罗解香，还有苏

① 《新元史》卷 252。

② 《新元史》卷 252。

木、犀角、象牙、翠羽和黄腊等。

罗解同中国关系密切，当时从罗解到福建泉州的航线上经常有商船往来。宋朝曾于 1103 年派人到了罗解。1115 年罗解国的使者正式来到中国。“（宋）政和五年（公元 1115 年）八月八日，礼部言 福建路提举市舶司状，本路昨自兴复市舶，已于泉州置来远驿，及已差人前去罗解、占城国……将宝货前来投进外，今相度欲乞诸蕃国贡奉使副判官首领所至，州军并用妓乐迎送，许乘轿或马……其余应干约束事件，并乞依蕃蛮入贡条例施行……外有罗解国，自来不曾入贡，市舶司自合依政和令，询问其国远近大小强弱，与已入贡何国，为此奏本部勘会。”^①在这具有一定妄自尊大的报告中，也反映了当时两国统治者之间密切的外交往来和友好关系。罗解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以后，多次遣使到中国进行访问。1155 年罗解给中国送来了一头大象，这是中国得自泰国地区的第一头大象。由于中泰两国之间经济、文化关系的日趋密切，当时已有一定规模的华侨到泰国地区经商和留居。南宋末年的宰相陈宜中在宋末元初为了躲避元兵，曾经经过占城（今越南中南部）逃到暹国，一直住到老死。^②元朝与罗解的关系也非常友好。据中国史书记载，罗解先后五次（1289 年、1291 年、1296 年、1297 年、1299 年）派遣使者出访元朝。这为以后中泰两国在更广范围的文化交流

① 《宋会要辑稿》第 197 册，蕃夷四。

② 《宋史》卷 418 《陈宜中传》